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数据

摇俄国思想家／摇(英)摇伯林(月)著 彭淮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月)第(月)次印刷(月)第(月)次印刷、重印)

摇(人文与社会译丛)

摇书名原文 摇(月)第(月)次印刷

摇(月)第(月)次印刷

摇Ⅰ 摇(月)第(月)次印刷 Ⅱ 摇(月)第(月)次印刷 Ⅲ 摇思想家-研究-俄国-近代
Ⅳ 摇(月)第(月)次印刷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数据核字摇(月)第(月)次印刷

悦)数据核字摇(月)第(月)次印刷

悦)数据核字摇(月)第(月)次印刷

‘与(月)第(月)次印刷’ (月)第(月)次印刷

云(月)第(月)次印刷

栽(月)第(月)次印刷

附(月)第(月)次印刷

悦(月)第(月)次印刷

月(月)第(月)次印刷

悦(月)第(月)次印刷

登记号摇图字 摇(月)第(月)次印刷

书摇摇名摇俄国思想家

作摇摇者摇[英国]以赛亚·伯林

译摇摇者摇彭淮栋

责任编辑摇府建明摇李瑞华

原文出版摇(月)第(月)次印刷

出版发行摇译林出版社

社址 南京 邮编 摇(月)第(月)次印刷

栽 砸 摇(月)第(月)次印刷

地摇摇址摇南京湖南路 源号(邮编 摇(月)第(月)次印刷)

印摇摇刷摇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摇摇本摇(月)第(月)次印刷

印摇摇张摇(月)第(月)次印刷

插摇摇页摇圆

字摇摇数摇(月)第(月)次印刷

版摇摇次摇(月)第(月)次印刷 月第(月)次印刷 月第(月)次印刷

书摇摇号摇(月)第(月)次印刷

定摇摇价摇(月)第(月)次印刷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作者前言	员
编者前言	员
导论：复杂的慧见（艾琳·凯利）	蚤
俄国与一八四八	员
刺猬与狐狸	圆缘
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	怨苑
辉煌的十年	员愿
摇一、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	员愿
摇二、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德国浪漫主义	员猿
摇三、别林斯基	员苑
摇四、赫尔岑	圆怨
俄国民粹主义	圆苑
托尔斯泰与启蒙	圆怨
父与子	猿远
索引	猿园
译后记	猿愿
编后记	猿苑

作者前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阅读与写作~~）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不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阅读与写作~~）为此书补足一篇导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犁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

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编者前言

我收编并重印以赛亚·伯林大部分已出版而至今尚未成集的文章,共得四册,这是第一册。他的论述大多流散四方,且往往论佚于僻冷难寻之处,其中多数已绝版,成集重刊者至今仅五六篇^①。这四册,连同他已出版作品的完备目录(重印于稍后一册)^②,将使他更多作品比前容易取得。其应如此,理由甚明。

为了这个集子,作者重写一些段落——主要是翻译文字。此外,除开必要的改正,以增补不足的参考资料,诸文都原形重印。

本册收取伯林谈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文章。《俄国与一八四八》(‘俄罗斯与欧洲’)初刊于二十六期《斯拉夫评论》(《斯拉夫评论》);《刺猬与狐狸》(‘刺猬与狐狸’)初刊于二期《牛津斯拉夫论文集》(《牛津斯拉夫论文集》),原文较短,原题《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后来稍加增补,以现在的题目,由

① 《自由四论》(《自由四论》)和《维科与赫尔德》(《维科与赫尔德》)其余选集都以别种语文的译本出版。

② 请参考与《以赛亚·伯林著作目录》(‘以赛亚·伯林著作目录’)刊于《牛津斯拉夫论文集》(《牛津斯拉夫论文集》),其增补与订正,见《以赛亚·伯林著作目录》,页 100。

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辛译）于一九五一年重印于伦敦，又由西蒙与舒斯特（杂社）在一九五三年重印于纽约；《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匀译）原刊于捷西蒙特斯（补译）主编的《俄国与苏联思想之续与变》（悦社），分编自集译主编的《俄国与苏联思想之续与变》（悦社），悦社再版时改名为《俄国与苏联思想之续与变》，总题为《辉煌的十年》（粤郭宅）的四篇文章，本名《奇妙的十年》（粤配家），分刊于《文汇》四卷六期、五卷十一期及六卷五期，原是一九五四年诺斯克理夫讲座 [在伦敦大学学院]，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第三节目部播出；《俄国民粹主义》是范求理（云）所著《革命之根》一书的导言，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号《文汇》十五卷一期；托尔斯泰与启蒙是一九六零年国际笔会赫蒙·欧德纪念演讲词，初刊于《文汇》十六卷二期，再刊于《比刀剑更有力》；《父与子》是一九七零年罗曼尼斯讲座讲稿，一九七二年由伦敦克拉伦顿出版社（悦社）出版，并在《纽约书评》刊出，又作为罗斯玛丽·埃德蒙兹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的导言。

(注：本文系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感

谢有关各方惠允重印这些文章。《辉煌的十年》、《俄国民粹主义》及《托尔斯泰与启蒙》原无脚注,此处仍旧。俄文作品之英译,若另无声明,概出伯林手笔。

熟知作者在此领域中作品的人，曾注意到两篇重要文章未收。其一为赫尔岑《彼岸书》（云里贼第几卷第几期），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裁第几卷第几号）并世杂著里，经世社员陈英译本导言；其二，为康斯坦斯·加内特《悦社藏书录前叙》所译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配增牙第几卷第几号）（经世社蔡世章再编再校）另见：阅管第几卷第几号编辑并缩简，毫籍再校另稿，经世社另源。不过，二论所涵盖，与本册有关赫尔岑的两篇文章大致相同。本册不选前者，后者归入思想史的一册，同样得宜。^③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此处只能先择最重要者。首先,这第一册的详尽编辑,是凯利博士的功劳,没有她在俄国语言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方面的专精知识,这工作不可能完成。在一段异常繁忙的期间里,她不惜时日,研究解答我的提问。对她,我受惠既巨,感激亦深。关于我不断坚持整个文集合出,伯林本人一直

③ 伯林同属这个范围的其他论述,读者也许有兴趣,备列如下。简短的电台广播谈话,得三篇:《成为神话的人——别林斯基》(《莫斯科晚报》,1956年1月23日),刊于《别林斯基文集》(莫斯科,1956年);《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苏联文学》,1956年12月),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56年);《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苏联文学》,1957年1月),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57年),后以《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苏联文学》,1957年1月),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57年)为题,重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美国,1957年);以及《俄国知识阶层的角色》(《苏联文学》,1957年1月),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57年)为题,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57年)。云里社另有三篇,谈现代俄国,不严格属于这范围,但与本书所收诸文颇有可以合勘之处,如《斯大林元帅与治术》(《苏联文学》,1957年1月),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57年);《俄文化中之沉寂》(《苏联文学》,1957年1月),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57年);与《苏联知识阶层》(《苏联文学》,1957年1月),二文都刊于《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57年)。关于书评,以及其余比较小规模的作品,请读者参考注②所述书目。

相当怀疑、而且愈来愈怀疑值不值得。但是,对这点,以及对我经常过嫌苛求的细节探访,他仍一贯周到体贴、亲切和悦,慨赐教益。关于《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莱斯莉·张伯伦(译)的协助堪称珍贵。伯林的秘书帕特·乌捷欣(译)的制作索引,也在所有阶段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协助与鼓舞。

亨利·哈代
一九七七年二月

附摇言

上面这篇前言写成以来,已有两本文集以精装本问世:一为《概念与范畴:哲学论文集》(译),一为《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本文注②所指的伯林著作最新目录,收在上述后面一册里。

前页所提赫尔岑《彼岸书》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有平装重印的译本,伯林所写导论亦经修订,附入其中。

《俄国思想家》曾由霍加思出版社(译)再版,有所增补。我们这本新版的《俄国思想家》,另外又作过几处小小订正。

亨利·哈代
一九七九年四月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摇摇为了向莫洛尔女士解释俄国革命，罗素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聚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

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对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制幻想”(Early 20th Century Russian Thought)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览后文艺复兴世界(从文艺复兴到现代)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Internalize)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主题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

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化的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责任,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责任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与极端即对立)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与对立)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不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马基雅维利与赫尔德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与精神强制)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顺从(与精神强制)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

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广场恐怖症: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宪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一种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

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目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至理名言)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忍受痛苦以求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象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行为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

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零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狂热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象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摩洛神(摩洛神)。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显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此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

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言里^①,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零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足堪伦比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仰,来洗涤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平等理想)与优异(贵族理想)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

^① 这两篇导言,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言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

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方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